

# 今 日 評 論

期九第 卷五第

這一週

三國同盟之後

建設新中國與發展法律教育

大學應該怎樣

我們對於西化的態度

談談獨裁政治

何永佶

李浩培

費鑑照

呂學海

王翰愚

民國十三年九月三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許執照號一第新類報紙

# 這一週

**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自本月二日起召集於陪都。這一屆國參會，在組織和職權上，比前屆均有重要變革，更進一步樹立民主政治的規範；並且這次大會適於太平洋風雲緊急之時舉行，對今後國家對策將加重新擘劃。所以全國同胞對這個民意機關期望更大更切。國參會本是戰時政治的規制，非可比於尋常的議會，但其所負的使命，却是非常重大。這三年以來，它經過了多次的機會，協助政府，執行國策，對抗戰建國，均多貢獻。我們於此更希望這一屆國參會，應着抗戰新形勢的需要，加倍努力發揚前績光榮的成績。在國事現階段上，軍事與外交，已有固定政策，大家不得有所分歧，而目前特別需要集思廣益的，無非是大後方經濟建設的各項問題。由此而觀，本次大會以經濟、物資、物價、糧食等問題，為討論的主要範圍，是近情合理的一種規定。關於這些重要問題，各參政員除聆聽政府報告以外，還應酌量提出建議或詢問，始不悖集思廣益的要旨。

保加利亞自始即聲明一旦德軍入境，勢將難加以抵抗，所以在其加入軸心同盟以前，世人即預料保國祇有向德屈膝之一途，其實，保國被迫加盟，並無實際的重要性，不過將保國受德控制的既成事實，加以正式的承認而已。保加利亞是弱國，其屈服的苦衷，世人也很了解，但事前既不肯與土希兩國結誠合作，又貿然開罪了英蘇兩大強國，其甘心助紂為虐於此可得證明。英國與保絕交，到今將成事實，此後必不再顧保國的「中立」，採取一切防德的措置。蘇聯對保國允許德軍入境一舉，亦表示極端反對，且已向保國提出嚴重抗議。外間許多人認為蘇聯此項抗議，就是對德不可侵犯海峽及土耳其之警告。德軍倘假道保國以侵希，則徒然擴大戰爭範圍，使蘇聯及土耳其不得保守中立，在這種場合之下，德國在東南歐未必能得到更大的行

動自由，從這點上看，進兵入保是德國一種冒險行為。

德國進兵入保後，又想以外交手段，勸說土耳其就範，而土耳其是否將受其誘，是世人密切注目的一個問題。日前土國官局有一重要聲明，大意稱：德軍在保之活動，若使巴爾幹引起戰事，則土國為自身安全計，或將參加英國方面作戰。此項聲明發表，係在英外相艾登離土之後，由此可見艾登此行頗有效果。這次艾登訪土，其使命是會商英土防務，經過多日的談判，卒議定軍事合作辦法，預料一月德軍南進，即將付諸實施。土國依原來立場以對外，其接近英國是一定的傾向。事實上在東地中海及近東，土英二國唇齒相依，不能不求互助。土國既是英的盟友，一旦安全受威脅，英必傾全力以赴援。就地勢上言，土國除聯英之外，還應與蘇聯互通氣息，因為蘇聯對海峽的關注，無形中對土國安全是一層保障。此時德國倘冒昧假保侵希，則當其國者是土耳其。而蘇聯在現勢下，對土仍賴其代負保衛黑海之責，如土國受着蘇聯的威脅，則蘇聯將取何行動？這是德國目前所當考慮的一大問題。從這點上看來，德軍在東南歐的新策動，並非毫無實際困難的。

倭寇的南進，目前仍在積極部署與準備的階段。綜合這一週間電訊所傳的消息，倭寇的行動有三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第一是倭寇加紧壓迫法越，割據南寧，自維琪政府拒絕日寇所提和解條件後，倭寇即向越南東京區大量增兵，並下令撤退越南日橋，目的很顯然，是想以武力威脅法越屈服。泰越科紛解決後，倭寇的第二步驟，必是強索兩國南部海陸空軍的駐軍權，積極佈置為南進的根據地，作南攻馬來，新嘉坡或西侵緬甸的準備。第二是日寇

南，瀕洲島築有堅強的海空軍根據地外，近復在大鵬灣與葉機場及海軍設備

「謀作爲海軍補給站。日寇自英美態度堅強，積極強化遠東軍事根據地後，仍積極進行，絲毫沒有放鬆。照這情形看來，倭寇似乎「非到黃河心不死」，除非歐戰有極大的意外變化，倭寇似無悔過可能。正如前任倭艦隊司令高橋所云：「日本南太平洋政策，已毋庸再加討論。目前日本全國之責任，端在以沉默之態度，抱堅定之決心，從事實現該項政策之準備，一俟準備完成，即努力實現云」。

東京的泰越談判，因日本強迫法越割讓東埔寨省的四分之一及老撈省

的三分之一土地予泰國，維琪當局拒絕接受，一度陷於停頓。我們認爲維琪的處置非常適當，並勸泰國勿貪目前之利，而供倭利用。但根據這一週間的消息，維琪政府因倭寇增兵東京區，撤退越南僑民，似有畏縮屈服之意。如維琪政府果直接受這種調解，失地猶其餘事，法國的威望掃地以盡，將何以維持越南的主權？且日寇慣於欺善攻弱，貪得無厭，此後要求必將層見疊出，維琪當局又當何以應付？倭寇早已公開發明「大東亞新秩序」包括越南在內，維琪政府若不早圖保越之方，而一味遷就退讓，積極之勢既成，恐將陸賄莫及矣。同時我們願再提醒泰國當局，日寇的強迫法越割地，決非竭誠贊助泰國，正所謂誘之以小利，欲遂其大謀罷了。貪小失大，泰國當局不可不

警加防範！

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正在開始大規模的勸募運動。此舉是由於國民參政員的動議，自可視為全國民意的總表現。就購債方式上來講，這次也與以往不同，完全以自由認購爲原則，絲毫不帶着強制的性質。蔣委員長爲這項運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闡述勸募的意義，既懇切又明晰，實在值得我們細讀。購買公債，襄助國家，是愛國心之表現，而努力推行勸募，亦是愛國工作之一種。所以我們希望各界人士，勿誤認勸募爲小事，亟應利用原有社團，分別組成團隊俾使推行盡利。尤其各界領袖，更應首先領導提倡，轉播知識，以身作則，然後勸募運動，始克發生偉大成績。

最近解散新四軍事件，是中央整飭軍紀所必需的一種措施。此事件發生以後，外間會散佈種種謠言，其中多含有曲解中央意旨的作用。尤可痛心的，是一部分自命左傾的青年，爲無稽謠言所迷惑，相率離開學校，潛逃藏匿，惟恐殃及池魚。這真是庸人自擾。新四軍事件，純系軍紀的問題；雖然因爲這項問題發生，而引起不必要的政治糾紛，但我們總以爲中央當局對此當善爲處置，必不至針對某一黨某一派，而無端箝制青年的思想自由。神經過敏者其速悟矣。

## 二 國 同 明 日 之 後

何水信

面對事實，雖則那事實會殺了我一。

談國際關係的，最忌「願望的想頭」（Wishful Thinking）。我們希望甚麼事發生或甚麼事不發生，心裏不由得就以爲那件事一定會發生或不發生：這是人之常情。例如我們愛一位小姐，總希望着他也愛我們，而心裏也不由得以爲他一定會愛我們；這就是「願望的想頭」。在戀愛的戰場下，「願望的想頭」的對或錯，影響還少，頂多不過一小姐的得失；但在國際的戰場上，「願望的想頭」如一有差錯就不得了，整個國家遭殃；所以學問上有一樣需要「科學的態度」的，那就是國際關係。甚麼是「科學態度」呢？赫胥黎 Thomas Huxley 有一句很好的定義：他說，「上帝呀！給我力量來

現在國際關係裏一大事實，就是去年九月廿七日的三國同盟。將來的歷史家一定會把這個協定列爲旋轉乾坤，判定勝敗的一個協定。其重要性不亞於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和一九三六年的防共協定。三國同盟是有牠的必然性的，理由簡單：世界上有兩種國家，一種是要「改變」而另一種是不要「改變」：德義日屬於前一種，他們攬在一起圖謀混水捉魚，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所謂新秩序就是「改變」後的局圓的意思。英美是屬於後一種，其聯合也是必然。蘇俄呢？他一方面地大物博，佔全球六份之一的土地，可以自

給自足，其不要「改變」的情緒與英美相同。但他却受着德日意東西南夾攻的威脅，爲着自己安全起見，又不能不稍要一點「改變」，以謀國防之充實。年來蘇俄之攻打芬蘭，佔據波蘭，吞併波羅的海國家，與暴日勘定滿蒙邊界，將來或在土耳其及近東一帶有所動作，都不外以後一種情緒爲出發點。所以蘇俄是一種介在中間的一個國家，他既不像德意目的需要大大改變，也不像英美的毫不要改變。在現在情形下，他需要小小改變，凡可幫助他取得這小小改變的都可作他的朋友；以往德國就利用這點來獲得蘇俄的友誼。根據這個簡單道理，我們敢說目前蘇德還須作朋友，還不至於翻臉成仇，因爲近東還剩着一點小小改變是蘇俄所欲得，而是只有德國才能幫助他取得的；因爲英國壓根兒不願意近東和中東有絲毫改變，所以在近中東局勢有所改變前，一切的英蘇作朋友的傳說，我們都可以當他做「願望的想頭」。但如蘇俄小小改變的計畫完成後，他在國防及經濟上都達到了飽和點其立場將與英美者完全相同，到那時他也將變成一個毫不要改變的國家，但受着東西南三面夾攻的威脅，則將會利用美國參戰的好機會，把其國力擲入不要改變的國家的殲滅裏，以解除這種威脅並以「保其國」。所以我常說只有美國參戰才可促成蘇俄參戰。在三國同盟前，我會說過俄國是「謎」的國家，而美國是「惑」的國家，要融解「惑」「謎」，須從「惑」始！三國同盟的用處，正在幫助美國消除他以往的「惑」。

在同盟前，美國還是沉湎於「惑」中，舉棋不定，要前進又後退，要强硬又軟下去，結果變成我們所說的動口不動手的「君子外交」。三國同盟後就不同了，美國今天始恍然於自己的危險，知道再不能沉湎於「惑」中於是下大決心，一面自己努力製造軍火，一面以金錢兵器援助被侵略的國家：十一月卅日的一萬萬對華借款，並不是我們有甚麼了不得的神迹，實在是我們拜三國同盟的賜！

國際關係的現狀猶如天體運行的現狀，在天文學內，天體的互相吸引，互相排拒，均爲力的表現。如太陽用牠的力吸引水星火星地球，而地球又吸引月亮，令他們都繞着日球旋轉，而自成系統。國際關係也是這樣：現在世界擾攘不寧，殺人放火的根本原故，簡單說來，是希特拉想把一個英國的太陽變成德國的太陽。全世界的問題都跟着這英德爭霸的中心問題旋轉着；全世界的緊張焦點，在寬不過二十英里的英倫海峽。三國同盟是英倫海峽的產

物。

三國同盟是一個「掩羞面而見青天」的一個協定，因爲牠把國際防線分得清清楚楚，把欲「改變」與「不欲改變」，把「侵略」與「反侵略」兩邊的陣容擺成一個二字形，兩邊的當局再不能游移不定；妄有空想；兩邊都知道希特拉所說那句話的意義，「這兩個世界不能並存」，把以前的基於姑息政策（appeasement）的猶疑玄惑一掃而空，這個在羅斯福總統十二月廿九日的「爐旁談話」及一月六日之對國會咨文裏，都表現得清清楚楚。現在我們談談這個「擦霧見天」的協定對於各國的利弊。

首先談德國：這個協定對於他是有利的，德國爲欲改變現狀實行侵略的立場，早就在希特拉「我之奮鬥」及他歷年來之行動內，表現了清清楚楚，這個協定未嘗畫蛇添足。換言之，有了這個協定德國未嘗現出更多的侵略原形；沒有這個協定，德國也不見得少帶了侵略野心。世界早知道德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這個協定毫未改變世界對於這個國家的觀感。但有了這個協定，德國在西方抓住意大利，在東方抓住日本，兩個都是在上次歐戰內英國的與國，德國的仇敵國，現在却變成了德國的與國而英國的仇敵了。還不止此，抓住這個協定，德國可以拉羅馬利亞，匈牙利，將來也許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西班牙等國入夥。上次歐戰內英國的朋友俄國，日本，意大利，羅馬利亞現在都給德拉走了，使他們不再幫英國，即此一點就不能不算是德國外交的成功，而三國協定實爲這成功的結晶品。在戰略上，德國可利用這個協定在西方利用意大利的海軍，在東方利用日本的海軍，來牽制英國的海軍，使英國的海軍在德國渡海大舉攻英時，不能回到北海及英倫海峽處援助英倫三島：這是三國同盟對於德國的大用處。

如這個同盟有一點對於德國不利的地方，那就是加緊美國的物質上援英。但從德國打算，無論三國同盟美國總是以物質援英的，有了同盟後不過把美國輸往英國的物質加倍加快一點罷了。惟德國計料美國現時開始製造軍火，不會那麼快，而明年春天德國就預備大舉進攻英倫，所以加倍加快從德國看來對於他整個計畫不發生嚴重影響。但有了這個同盟，明白說明如美國參戰則須冒受三國之夾攻，使美國對於實行參戰一舉不能不慎重考慮；這從希特拉看來是足以抵消「加倍加快」之不利的。

三國同盟對於美國惟一的利，是把美國叫醒。這幾年來，美國猶存侵略

國家可以用「戰爭除外」的方法使其就範的妄想，同時這黃金國家太舒服了，不願打仗，所以中立法約翰生法軍火禁運案等一件一件通過，對英援助也只限於商業借款而不敢涉及政治。有點像駝鳥埋首於沙中而自以爲安全的樣子，如沒有這個同盟，美國也許還沉湎在這種意態之中，九月廿七日後，美國始恍然於侵略之巨火已燒到門口，始從一大覺中欠伸而起，這個巨人，不起則已，起必大動，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天亮了，人得該醒；大火近了，美國也該醒；在這個時候叫醒美國，是對他有利的。

對於美國有利，即是對於英國有利；把美國的援兵加多加快，即是對於英國一個莫大的幫助。

對於意大利與日本呢？那就不同了。意大利早已加入德國作戰，所以他欲改變地中海現狀的計劃，並不因爲這個同盟而加強。反因爲三國同盟的壯胆，在希臘魯莽行動，碰了一鼻子灰！英美因爲要懲打德國，向來希望意大利棄邪歸正，如無這個同盟，則意大利如稍微表示動搖，英美沒有不願意抱之滿懷把他從德國懷抱拉開的。有了這同盟後，意大利已與魔鬼訂約，要走也走不了，而英美看見他已與魔鬼訂了十年的合同，「抱之滿懷」的熱情又冷下去。於是以前美國輸往意大利的貨物可以減少以至於無；意大利在美國之財產，美國可以封存而不許動用。爲了這個同盟，意大利既不能多討好於德（因爲助德作戰就夠了）而反多得罪於英，於美，於俄。因爲意大利借着三國同盟的壯膽而在愛琴海有所動作，企圖伸勢力入黑海的舉動，是蘇俄所深惡的！概括來說，意大利可以說上了希特拉的當。

日本也上了希特拉的當，有一作家說，三國同盟是個「金磚」（gold brick），希特拉賣給日本的，你想磚是泥作的，那會是金做的？說這個磚是金做的，那一定是假的，日本就得了一個假的金磚！這個假的金磚是由德國外交部一個特派人員名叫 Heinrich Stalmers 從柏林挑到東京，拿到近衛松岡的門口叫賣。近衛松岡起先也起疑心，後來居然被這位德國挑担叫賣者花言巧語迷了，於是就給了一個價錢，那位叫賣者也不還價，伸手接過錢來就算做了一件交易！

日本買這金磚，原想借着他「南進」，搶英國在南洋的東西。但日本傻了，因爲英國在歐洲如未被德國擊潰，則雖有這個同盟，日本南進侵英未必能有勝算。英國如在歐洲被德國擊潰，則兵敗如山倒，其首領被擊傷的鯨魚

全身都可隨處受人宰割，則雖無三國同盟，日本也可以南進，也可以搶香港，新加坡，緬甸，荷印。你看去年，雖無三國同盟，而日本還不是在天津大加美國人男女以侮辱。英國還須忍氣吞聲，因爲英國人熟知「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爲着不欲使日本投到德國那邊，英國情願送禮。七月十八日的封閉滇緬路，就是英國對於日本的一個送禮；如無三國同盟，也許這個禮還是送給日本的。日本明明白白正正式式加入德國那邊，則英國人想送禮日本尙歸德國，不送禮也是歸德國，就索性不送禮了；這就是爲甚麼十月十八日滇緬路開放的道理。

英國可以不送禮，美國更可以不送禮。以前爲着不願意日本加入德國那一邊，美國也稍爲送過日本小小的禮物，如商約廢止後不實行對日禁運，巴納號炸沉後，還把軍艦送日本駐美大使的遺骸回國等等，都是美國姑息日本的象徵。三國同盟後，明明白白說如美國打仗，則日本亦必助德對美作戰，美國知道送禮日本尙歸德國，不送禮也是歸德國，也索性不送禮了。當去年正月間，日美商約廢止時，那時許多人希望並且以爲美國會對日實行禁運，我那時不敢隨聲附和，在報上略述甚麼美國不至於對日實行禁運的理由。三國同盟，就大大的不同了。「姑息」既無必要，以後美國加緊對日實行禁運，都是意中之事。

日本的上當就在這裏，因爲三國同盟而失喪了英美的「姑息」，使英美對華加緊援助，把解決日本人所謂「中國事件」延展到遙遙無期，同時意大利在得英協助的希臘碰了一鼻子灰同時日本希望從三國同盟所可得到的「南進」機會也延展了。所以她可以說一無所得，賠了夫人又折兵，失之東隅又不能收之桑榆，徒供作德國在遠東的工具，日本可以說上了希特拉的大當。

三國同盟對於日本不利即是對於中國有利。日本一無所得，而我們得了滇緬公路的開放，得了美國一萬萬元的借款，得了英國一千萬鎊借款的謠言，得了美國多派飛機來華，得了美國遣派潛艇軍艦到菲列賓，凡此種種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是外邊送上门前的意外橫福，是受賜於日本的外交笨拙。現在日本的松岡比起簽訂英日同盟的林董，比起簽訂防共協定的有田，都覺得相差太遠；如日本倒下去，將來的歷史家必把這個三國同盟作爲分判日本國運盛衰的界線，松岡爲日本千古的罪人！

我們中國應該快利用這三國同盟給予的有利局面，圖謀我們國家的整

個翻身。中日事件爲整個世界局面之一部，所以中日問題也須跟隨歐戰的解決而解決，還是以大政治觀點看來的說法。六個月前，我在某刊裏說「惑」，「謎」、「慌」、「犯」、「抖」未完全消除融化前，中國在國際政治裏的舉動可以曹緩。惟「惑」（美）與「謎」（蘇）一經融化，中國即須拋棄中立，擇定可以取勝的一方而加入那邊，庶可在最後勝利到臨前共享勝利的甜果。三國同盟後，無論在立場上，在實際利益上，在戰略上，都應加入英美與之採取同一戰線。在立場上，我國與英美同是不要「改變」，反對侵略的國家，其應與之相聯共抗侵略國家的侵略，自屬理之當然。在實際利益上，如我們助英美，英美亦可助我們；如我們多多助英美，英美亦可以多多助我們。前年歐戰發生時，即有眼光遠大的人主張我國拋棄中立加入民主國家作戰，可惜那時顧慮太多，遲遲未行，假如行了，中國已變成英國的一同盟，滇緬公路也許不至於封閉三個月。現在時機到了，與英美採同一戰線爲刻不容緩的事。

戰戰的結果不出兩途：一是美國在歐洲勝英，二是德占歐洲勝英。我們撇了英國盟友之後，英國如勝德，我們自可分得勝利的一杯羹，同時我們的仇人既做了德國的盟友而變了英美的敵國，則英美勝德後自必與日本爲敵，幫助我們來打擊我們的仇人，勝敗之數，在乎我們：我們如仍株守中立，對英美還是泛泛之交，則英美亦可以把我國視作泛泛之交，在勝德後與日本妥協，來吾們於不顧。

假如萬一德國在歐洲勝英，那即是德國攻入三島，英國須要遷都，那我們也不怕。因爲放棄倫敦不能說是全英帝國的屈服，猶如放棄南京，不能算是中國的屈服一樣。即使英國被迫而放棄英倫而須遷都至加拿大或印度，至少有一大部份海軍會隨着政府遷移至加拿大或印度。無論是加拿大或印度，英國將從一大西洋的海權國變成「太平洋上的海權國」。當川駛在太平洋，與畢日接觸磨擦的機會愈多。日本那時如繼續妄想獨霸太平洋，冒險南進，則必與英國東邊後的海軍勢力作正面衝突。英日的海軍衝突後，美國與英國是唇齒相依的邦，自必與英國之遠東海軍合作。那時始有擊破日本海權的可能。

照常理說，要擊敗一陸權國須要另一陸權國，要擊敗一海權國亦須用另一海權國，打個比方，水滸傳上的黑旋風李逵和浪裏白條就是一個是陸權國而一個是海權國。海權國的張順在陸地上打不過李逵，所以須把陸權國誘至水上，把李逵灌個半死。如欲在陸地上打敗李逵，必須用另一陸權國。

如武松；如欲打敗海權國的張順也須用另一海權勢力如阮小七。就算我們能把日本在華軍隊盡數驅入黃海，還剩有日本的海軍，可以封鎖我國沿海，我們無法泡製。我們既不是海權國，則如欲擊破日本的海權，謀中日問題的一百了，必須借用另一海軍勢力，而這個場合可在英美海軍在太平洋合作中實現，而這個海軍合作又可在美國遷都至太平洋而以之爲繼續抗德的大本營後實現。

所以我們應該趕緊整頓內部，鞏固團結，來利用這個國際有利局勢。假如我們以爲三國同盟後有了英美撐腰而疏遠蘇俄，復從以疏遠或排斥與蘇俄不是沒有關係的政黨或軍隊，那是大錯。因爲蘇俄是與我們接壤最近而關係最密的友邦，以往蘇俄借給我們的二萬萬五千萬的借款，還比任何兩個國家合起來多。而且上面說過，蘇俄現在須做德國的朋友，但總快有一天達到她國防與經濟的飽和點，她的小小改變計劃完成後，將使我們及英美採取同一不要改變反對侵略的立場，所以在此時更不宜因些小事故而開罪於她，使她到立場相同時以我們爲不够朋友而坐視不予援手。抗戰既然根據統一陣線，則統一陣線如有裂痕，即是影響抗戰的繼續進行，抗戰如不能繼續進行，即是不能利用三國同盟所賦予的有利局勢，以謀我們國運的昇進。我們站在無黨無派的國民一份子的立場上，當然希望統一陣線維持於不裂和國家軍隊的一元化。

上面不是說過嗎？科學精神即是拿出決心來面對事實，雖則這事實可以殺我，無論我們怎樣解說，擺在我們面前的無情事實，是我們國內有兩大政黨而各擁有自己的行政區各擁有自己的軍隊，這種局面在現代國家未形成以前固是數見不鮮，而在近代國家中是絕無的事。近代國家中可有幾個政黨，但只能有一個軍隊，這個軍隊是屬於國家的，而不是屬於另一黨的。以往，如俄國，製造國家肅除的毛子是當權的政黨用軍隊撲殺他黨及其軍隊。蘇俄的共產黨經過三年的苦鬥就得到這個結果。但這個法子在我國十年來已證明了行不通，在大敵當前的今日，更行不通。

那麼，還有別的法子沒有呢？曰有。國家的武力統一，根源於政黨統一，政治統一了，然後軍隊統一才有辦法。以往英國的政治算是統一了，有一恆久性的吏治制度，各黨各派共同承認大選爲輪流執政，誰在朝誰在野，人民是最後決定者，但大戰後英國人仍以爲他們國內政治還不够應付戰爭所需。

求的統一，所以把黨內的保守黨領袖邱吉爾升他為舉國一致的領袖，而不是保守黨一黨的領袖。同時在這個全國領袖主持下的最高政治機構戰時內閣內，還含有勞工黨二名，有自由黨一名，有保守黨二名，這些人入閣不單是根據於他們代表的黨而且根據於他們所代表的政策與能力。所以英國雖敵當前而能舉國一致的對外。

我們現在願不願效法英國？是不是願把我們一黨的最高領袖昇舉為全國

## 建設新中國與發展法律教育

李浩培

在現代中國一般人的腦海中，似乎有一種思想存在，以為現代中國所需要的，並且祇是飛機、大砲、輪船、汽車等東西。我們要抗戰必勝，我們祇要飛機大砲及其他類似的東西，我們要建國必成，我們也祇要輪船汽車

及其他類似的東西。因為我們祇要以上種種東西，所以我們就祇要培植能够製造此種東西的人材；因為我們祇要培植能够製造此種東西的人材，所以我們就祇要提倡並發展實科教育。至於法律，就一般人看來，似乎不是可以尊崇或注意的東西。一個強盛的國家的建立，似乎與法治的建立沒有甚麼關係；總有些嫌關係，似乎現在我國讀法律的人已經够了，或且太多了，所以我們不用提倡或發展法律教育。我們的政府，似乎執行這一個政策已經多年，並正在加強執行中；我國大部份的青年，受到政府提倡實科教育的影響，正在努力實學，以期完成建設新中國的使命。簡括言之，現階段的中國教育政策，是提倡實科教育抑制法律教育的政策，現代中國的青年，大都以讀工科爲榮，讀法律爲恥；現代中國大學裏，充滿了工科學生，而法律學生則逐漸減少，快要成爲鳳毛麟角了。

很可尊敬的讀者們，看到以上情形，將有甚麼感想呢？筆者的意見，或許和你們不完全相同。但是一國的政策，應該是可以公開討論的，所以就大膽的寫在下面，以供商討、批評、探討。

筆者的意見是：建設新中國，除提倡實科教育外，必須隨時提倡法律教育。

我們看到凡世界的強國，莫不有很多的工廠，此種工廠能建造很多的飛機大炮輪船汽車等東西，我們就以為強國之所以成為強國，祇因爲有很多的此種東西的緣故；弱國之所以成爲弱國，祇因爲缺少此種東西的緣故。

但是事實是否如此呢？我們承認：凡強國都有很多的工廠以及飛機……但是，我們要成爲強國。我們也得有工廠，飛機……所以我們要提倡實科教育，我們要在最近造就很多製造飛機等東西的工程師。但我們絕對不能承認工廠，以及飛機等東西是構成一個現代強國的惟一因素。在一個現代強國裏，隱藏在工廠，工程師，飛機後面，還有一個因素，不易爲一般人所發見，這個因素，繼續不斷的在督促每一工程師，使其盡最大的責任；在管理每一工廠，使其出更多的商品；在監視每一飛機，使其得盡量被利用於抗戰建國，而不被惡勢力爲不正當的利用。這個因素是什麼？就是法治。換言之，就是一個個人，不論大官小民，必須遵照法律所規定的義務做事，將其完全的力，量貢獻於國家，不以私廢公，不假公濟私。不論大官小民，如有違背法律者，換言之，即不履行法律所加予之義務者，依法懲治，絕不因大官有勢力而不罰大官，小民無勢力而濫罰小民。世間的強國，惟其有這一個因素，所以在平時能以全國的力量用於生產事業，而造成輝煌光華的國家；在戰時能以全國的力量，抵禦外侮，而得到最後的勝利。相反的，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這一個因素，縱令全國的人民，都是工程師，這國家也不能成爲強國。爲什

麼呢？

在這三國同盟給予我們空前有利局勢的當兒，我們極希望大家不要失掉這個好機會。

的最高領袖，把全國最高的政治面可以命令全國軍隊的機構，化成一個像英

這理由不難見到。凡法治的國家，因所有規定各大官小民之義務之法律

，都無執行，故法治國家之每一個人部將其全力貢獻國家。一國家的構成分子都將其全力貢獻國家，這國家還會不強嗎？相反的，一沒有法治的國家，她的法律，最多祇能施行於一小部份的人，大部份有勢力的人，例如有經濟勢力的人，有政治勢力的人，有軍事勢力的人，口頭上雖都擁護法治，但實際上的行為，却完全祇顧到個人的利益，不顧到國家的法律所加的義務。

此種具有勢力的人，違反了國家的法律所加的義務，執行法律的機關絕對不能加以制裁，以是法律就成為具文；以是一國內各構成份子的行為，違反國家利益者逐漸增多；結果該國成為一名義上之國家，實際上其構成份子大都在違反國家生存的原則之下，尋求其個已利益之滿足。此種國家，縱令全國的人民都是工程師，這國家所設的工廠，也不會很多，決不能及到一個強國所必須達到的數目；退一步言，縱令所設的工廠同一個強國一樣多，其生產的飛機等東西決不會很多，決不能及到一個強國所必須達到的數目；再退一步言，縱令所生產的東西，與一個強國一樣多，也不會全部被利用於建設國家，而必有一部份，或且一大部份，被利用於不正當的事務上。此種國家，怎麼能成為強國呢？

上面所說，完全是理論。現在且將我國及現代強國的史實，證明我的理論。我國清末的史實，很可顯示有工程師，工廠，大炮等，而無法治，尚不能成為強國。現代強國之成為強國，更可顯示強國除有工程師工廠大炮等外，尚有法治。

我國清末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輩，因與歐西列強接觸，已知強國必須有工程師，工廠，大炮，輪船，鐵路。於是派遣留學生赴海外學習科學，設招商局以經營航運，設造船廠以造輪船，設兵工廠以造槍砲，敷鐵路以利陸運，創海軍以固海防。但是這許多設施，是否能使中國成為強國呢？歷史所給的回答是：否，不能。海外回國的留學生，很少於學術，或事功上有所建樹，頗多成爲貪官污吏。招商局經營資本，歷年虧損，海軍軍艦頻數，原則可觀，而敗於劣勢的國家。其他各事業，亦無驚人成績。此何以故？不是因為曾李等祇看到及摹倣到人家的堅甲利兵，而沒有看到及摹倣到人家堅甲利兵以後的法治嗎？

現代世界強國之一是英國。英國以四千萬人口，而所建的大帝國，擁有四萬萬多內人口，其殖民地遍全世界，每天二十四小時，日光輪流直着，不

能算是一驚人奇跡。他們依靠了什麼而會有此種偉大成就呢？依一般人看來，強大海軍，興盛的工業，都是造成此強大帝國的重要因素。不錯；但是不要忽略了另一重要因素。英國不是最重法治的國家嗎？英國惟其最重法治，所以全體英國人都能以全力貢獻國家；所以四千萬個英國人，便產生如此龐大的力量，比現在我們四萬五千萬人所產生的力量大得多。

不但以上所述，可以證明法治對於建設國家的重要性，我們即以軍隊為例，也可以見法治的重要性。一國的軍隊，如要完成抗敵守土的使命，精良的武器是不可少的。但祇有精良的武器，就可殺敵致果嗎？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國軍的光榮戰績，並非完全由於軍器的精良，我們的國軍的有紀律，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軍隊的紀律，等於國家的法律。我們練兵，首重紀律；我們治國，怎麼可忽略法治呢？

綜上所述，構成一個強國的第一因素，是工程師，是實業，是飛機大砲。構成一個強國的第二因素是法治，是人人——不論大官小民——服從法律，以其完全的力量貢獻國家。兩個因素，如缺其一，都不能成立強國。此命題應是毫無疑義的了。

### 三

我國現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在這過程中，我們需要工程人材，需要發展實業，需要飛機大砲等等，所以我們需要工程教育；這是筆者所完全同意的。但筆者以為在這過程中，我們也需要法治；在將來我們抗戰勝利，自由興盛的新中國建立後，我們更需要法治。我們現在法治的程度，無論如何，不能謂為高，這是我們大家應該坦白承認的。因為我們的法治程度不高，我們在抗戰中所受到的阻力不小。舉一個很顯明的例證；現在最難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達到完全消滅國積居奇的問題。政府三令五申，希望禁止囤積；但是國者自國，積者仍積，以致民生所倚的食米，在四川嘉定，在筆者草書文的時候，每市斤價格，已達國幣一元四角，每市石價格，已達國幣二百元。我們都知道，這種囤積的行為，完全是妨害抗戰，違反國家利益的行為；但我們無法禁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雖造就很多的工程師，亦復何用？工程師同其他人一樣，決不是萬能的。工程師的技能及任務，在設計利用材料，造成可供人利用的東西；但他們決不能使社會中每一份子，都盡其應盡的責任。這個困難的國積問題，非工程師所能解決，必須厲行法治，方能

解決。我節省篇幅計，筆者祇舉此一問題，其他的問題，也可以想像而得。

簡括言之，我們在抗戰期中所遭遇的困難問題，其中一部份，可以因多造就工程師而解決；但其他一部份，雖我四萬五千萬同胞均係工程師亦無法解決。必須厲行法治才能解決。在抗戰過程中，需要工程人材，也需要法治；在建國過程中，需要工程人材，也不能缺少法治。我們現在已能顧到發展實業，培養工程人材；但我們於厲行法治方面，尚少顧及。

#### 四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欲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我們除提倡工業，發展工科教育外，我們必須厲行法治；但（二）我們迄今尚未真正厲行法治，以致遇到困難，尚無適當解決之方法。於是就發生如何厲行法治的問題。筆者認為欲使我國成為法治國，後列五條件，均須具備：

（一）政府要人認真厲行法治 法治既為強制的一個重要因素，每個國民，都應有促進法治的責任。但，政府當局，既有實權，便更當以厲行法治引導己任。政府要人，近來不是沒有關於法治的文章發表，但徒發文章還沒有用，要宣認真實行。法治的真義，在人人順從法律，事事以法律為準繩；違法者依法加以制裁，不因其有勢力而予以容忍；守法者依法加以保護，不因其無勢力而予以不公的待遇。政府固希望人民守法，人民也希望政府（包含大小官吏）守法。政府要人，如能一方面事事守法，以身作則，一方面對屬員不顧情面，嚴密監督，如有違法者依法制裁，則屬員守法的觀念，當逐漸增強，人民自亦開風氣起，以守法為榮。如是使中國成為法治國，因此興亡強國的基礎，實非難事。昔人所謂轉移風氣，繫於一二大員而已；我聲明，我們的政府當局，不可不三復斯言。反是，若政府祇希望人民守法，而政府本身不守法，大小官吏，均以守法為可恥，以不受法律箝制為榮，則何能望人民之實行守法。

（二）宣傳法治的重要 我聞一般人，無論受過教育與否，無論官吏或人民，守法的觀念，太薄弱了。大家以為法律者，可利用而無須遵守，可口頭服從而實際違反。所以我們向來雖法令多如牛毛，而實際上等於無法國。現代的中國人，了解守法的重要性仍不多。故吾人，如欲厲行法治，必先盡力對於各階級的人，宣傳法治的重要性，使彼等都感覺到法治是強國的必要因素，亦相差過遠。我們試思：我們要厲行法治，我們必須有很多的法律人才，在學校裏訓練守法的學生，使他們成為守法的公民。我們必須有很多的法律人材，在社會裏宣傳守法的重要性，使我們的公民，對於法律的應該尊重，都有相當的了解，而受政府的尊重，使我們的政府不致違法；我們要有很夠的法律人材，做我們各級政府的顧問，使我們的政府不致違法；我們要有很够的法律人材，做我們各級法院等的顧問，使牠們的行為，都納入正軌；最後，我們還得

索，所以法律必須尊重，違反法律，應為而且必將受到制裁。經這樣有效的宣傳後，法治的推行，必能順利。

（三）各級學校認真訓練學生守法的習慣 學生均係將來國家的重要份子。一人在學校內所受的教育，於其學生的品性行為，影響殊大。

各級學校，如能聘任法律人材，認真訓練學生守法，中國法治的前途，自必大有希望。

（四）加強司法及監察人員的保障 司法機關的職務，在執行法律，是法治的必要工具。一國是否法治，以該國的司法機關，是否能對於該國內任任何人有効的獨立的依法執行職務以為斷。過去我國的司法機關雖職權上對於任何人得執行其檢察審判等職務，而事實上司法機關所能執行職務的事項，不過一般無勢力的普通人民所發生的案件而已。司法人員如逃避此範圍，耽擱生命自由，便失其保障。現在我國的司法，關於這一點，究竟較過去改善多少，筆者尚未敢輕率斷定。人孰不欲保其身家性命財產？故欲真正法治，非加強司法人員的保障不可。監察人員，職司監察大小官吏的行為，於官吏（包含大小官吏）守法。政府要人，如能一方面事事守法，以身作則，一方面對屬員不顧情面，嚴密監督，如有違法者依法制裁，則屬員守法的觀念，當逐漸增強，人民自亦開風氣起，以守法為榮。如是使中國成為法治國，因此興亡強國的基礎，實非難事。昔人所謂轉移風氣，繫於一二大員而已；我聲明，我們的政府當局，不可不三復斯言。反是，若政府祇希望人民守法，而政府本身不守法，大小官吏，均以守法為可恥，以不受法律箝制為榮，則何能望人民之實行守法。

（五）廣植法律人材 我國現在所有的法律人材已足夠了嗎？已過剩了嗎？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可因吾人是否願厲行法治而異。如我們不願厲行法治，如我們以為法律不過是數値面的東西，實際上我們並不希望官吏與人民守法，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說，現在的司法人材已多了，已過剩了，我們自須改弦易轍，祇注意於工科人才的培養。但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欲使吾國成為強國，非厲行法治不可，則此答案自非合理，並無採取餘地。我們如以為此後須認真厲行法治，則現在我國所有的法律人材，不特質的方面，與外國相較，相去邈遠；即質的方面，欲以現在所有的法律人材，完成法治的大業，亦相差過遠。我們試思：我們要厲行法治，我們必須有很多的法律人才，在學校裏訓練守法的學生，使他們成為守法的公民。我們必須有很多的法律人材，在社會裏宣傳守法的重要性，使我們的公民，對於法律的應該尊重，都有相當的了解，而受政府的尊重，使我們的政府不致違法；我們要有很够的法律人材，做我們各級政府的顧問，使我們的政府不致違法；我們要有很够的法律人材，做我們各級法院等的顧問，使牠們的行為，都納入正軌；最後，我們還得

有較優量多的法律人材，亦立法機關內依三民主義的原則立法，在司法機關  
齊根據三民主義的精神執行法律。使我國的立法及司法，與世界最强的法治  
國可以並駕齊驅。我們試問問自己，我們現在所有的法律人材，質的方面，  
量的方面，是否能當以上種種的重任？

想退一步言，我們如果以爲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司法」，祇是爲敷衍門面  
的，我們的司法人材，也快要感覺到不够，廢除縣政府的承審員，遍設法院  
是政府既定的政策。法院裏的推事檢察官書記官等，依照現行的法令，都  
須正式法律學校出身，且非正式法律學校出身，決不能勝任愉快。如果現在  
不趕緊造就法律人材，將來遍設法院，推檢書記官等將從那裏來？到那時，  
恐怕我們不得不用粗製濫造的方法；但是粗製濫造的人，怎麼能敷衍門面？  
擴廣領事裁判權，是我國朝野多年來的期望，因爲一方面領判權是侵害  
我國主權的，另一方而領判權制度祇在我國還存在，其他如日本，土耳其遇  
到，埃及等國都早已撤廢了。觀英美等國政府近來的聲明，我國在抗戰完成  
後，撤廢領判權是不成問題的事。領判權撤廢後，住居我國的外國人的案件  
，將都歸我國法院受理。英美等國，因係法治國，期望我國法院執行職務的  
能力與獨立，達到較高的程度，使她們的人民有所保障。我們如能滿足她們

## 大學應該怎樣？

最近三年我們都看到新生的程度遠不如以前，我們都擔心，因爲大學校  
在中國是國家的脊椎，政府的官吏及社會上活動的一切團體，均在推動社會  
上的事業要維持社會中一切機構的動作，它們的辦事人員，都依靠大學供給  
。大學是人才的製造所，是大學負了建立國家一部分的重要責任。在抗戰勝  
利以後國家的建設更多而需要的人才也愈多，在這個時期大學製造將來應用  
的人才的責任，隨着這種新的局勢而增加，大學負着這種重大的責任，應當  
特別慎重選擇入學的新生，以便產生優秀的人才，供應抗戰勝利後的社會。  
但是，我們回顧這三年來大學入學新生的程度，不單使我們失望，並且使我  
們擔憂！一大部份新生因爲程度低淺讀些補習的功課，這些功課，早應在中  
學裏讀完的，這是一場很大的浪費，它的弊端不僅是浪費而已，對於大學會  
發生不良的影響，便是大學的程度隨着降低。這對於大學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 費鑑照

一國的成爲強國，其原因不但在該國物質文明的發達，而該國的風行法  
治，亦其一重要原因。現在的文明各國，因其本身莫不厲行法治，故觀察及  
評判他國，亦以他國的是否能厲行法治爲其尊敬與鄙棄的標準。我國清末及  
軍閥時代的紊亂亂紀，招得外國人「無法國」及「野蠻國」等的不堪入我們  
耳目的名稱。物質蟲生，自侮人侮，固自有由。現在國民政府以救國建國爲  
目標，筆者很相信。不過救國建國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厲行法治，而厲行法治  
的先決條件之一是造就質優量多的法律人材。現在政府的政策，似乎忽略了  
這一點；筆者站在一個公民的立場，自應善意地貢獻這小小的意见，以供學  
者的商討與批評，及政府的採擇。這篇文章，絕無攻擊任何個人的目的，這  
是無庸聲明的。

一、倘使這種情形繼續下去，學術上便會發生一個很大的危機！這種程度的低  
落與現時的神聖抗戰當然有若干關係，但是決不是完全爲了戰事的關係，在  
抗戰前幾年，一般的說，大學入學新生的程度已經不如以前了。近十年來大  
學在另一方面遇到另一個困難，這便是教授聘請的不易，普通一位教授月薪  
大約自三百元至三百五十元之間，單身教授領取這個數目生活上還沒有什麼  
大的問題，但是，倘使有了三四個孩子，爲着孩子們須付若干教育費，以及  
其他的費用，生活上便發生困難了。在中國小家庭的一切必然要完全負擔，  
很多人常常同時還要負擔大家庭的全部費用或一部分的費用，教授的經濟情  
形更覺得困難，所以，許多大學教授放棄了教育的生涯，去從事於別的事業  
。抗戰以後物價高漲，教授的月薪不如一個洋車夫的收入，離開教育生活的  
人更多。看了上面所說的兩種現象，我替大學擔憂，我也替中國的學術擔憂

所說，大學該怎樣辦的問題。我想大學要完成它的任務應該做到下列三點。這三點大學單獨做起來是很困難的，還要靠賢明的教育當局盡力去設置。

第一、大學的目的，依我的意見，在於說學者和替國家社會造成辦事的幹部，來領導社會前進。為了這種原因，大學選取學生應該特別慎重，特別嚴格。近十幾年來因為大學數目的增加與日增給更多的青年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於是大學降低了以前的標準，不顧品質取學生，造成今日大學的現象。我們應當記着大學教育不是公民教育，它有它的特別目的與任務。這點我在上面已經說了。大學校為着達到它教育的目的與完成它的任務，它應選擇聰明的、勤懇的、認真的青年來教育他們，給他們嚴格的訓練，以知識灌輸給他們，並且使他們有主動的能力和健全地運用思想的能力。這樣，他們畢業以後，或繼續研究學術，或去領導社會，才有優良的結果。每年中學畢業出來的青年很多，大學只吸收一小部份，那末，倘使其他有志升學的青年怎樣受高等教育呢？要解決這個問題，給其他有志升學的青年一個上進的機會，政府應增添設立各科專門技藝學校，來給其他不能考入大學的青年一個機會。一般地說，無論哪個人都有他的特長，只要好好地教育他，訓練他，這即能長能發展出來，供給國家社會應用的。抗戰以後，教育部已經設立幾個技藝專科學校，但是，數量還不够，自後應再增加，使大部分中學畢業生，如有升學志願的，得進專門學校，不必送入大學裏去。

第二、教授教育學生為國家造就人才，他們替國家做了一種基本工作，政府酬勞這種工作，應給他們足夠的薪水，使他們安心從事於教育青年和研究學術，大學教授教書與研究當同時並進，因為這是他們的任務，但是，要完成這種任務，大學與教育當局須給他們幫助。做研究工作不單需要時間，並且需要金錢，最近教育部頒佈的大學教員任用律規定專任教員每星期須擔

任九小時至十二小時，若每門課程平均以三小時計算，那末，一位教員至少擔三門至四門課程，在上課以前他須有足夠的準備，下課以後，尚須閱讀和改正學生的練習或寫作。三四門課程已使他的精力與時間用到大限度，那樣他沒有精力來從事研究？但是沒有研究便沒有學術的進步，倘使大學教員不做研究工作，便負了他神聖的使命，而大學也不能完成他的重大任務，反之，大學應減少教員的上課鐘點，給他研究的機會。同時教育部應指撥專款來幫助教員做研究的工作。教育部最好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統整計劃全國大學的研究工作和審查研究成績。這樣可以避免許多無謂的浪費與重複。這個委員會的人選，可由教育部提出候選人若干，而由全國大學教授投票選出，任期三年。這是一個比較公平的辦法，同時還可免除官家指派委員會的缺點。

第三、大學完全是一個學術機關，教授應該參加學校的行政。設立評議會或性質類似的校務會議以決定大學校策，及推進校務。這種會議內，除校長院長及系主任外，應有教授代表參加，而此項教授代表應佔全體委員百分之一六十。教授的聘請與解聘及其他重要事項都須經這個會議的同意。這樣，一方面可以保持學校校策的永久性，另一方面，教授與學校當局消除磨擦而能協力合作，發揮大學教育最大的威力。一個大學校辦理完善，決非一二人所能做到，須有全體教授合作，才能成功！

近十幾年來，全國都喊提倡學術；使學術獨立，不依賴歐美的學者與大學，這是一個很好的醒悟，很好的現象。

但是，要達到這種目的，完成這種工作，須得使大學健全起來，倘使大學不健全，那能提倡學術，那能使學術獨立呢？又那能造就領導社會的健全的領導分子？所以使大學健全是第一項重要的工作，而使大學健全的方法，我想，只有實行依照上面所說的三點才能做到！

## 我們對於西化的態度

呂學海

最近在「今日評論」上又讀到幾篇批評全盤西化的理論文章，其中反對這個理論最力而其錯謬最多的要算伍啟元先生的「論「全盤西化」」。（載該評論五卷五期）伍先生的文章包括五個要點：第一，他認為「全盤」兩個

字是不通，就是「西化」一個名詞也有很多困難；第二，他認為文化有其情性，一個國家不能完全拋開其原有的生活樣法和社會制度而全盤接受另一種新的文化；第三，他指摘全盤西化論是一種拜洋主義和自卑主義，是表示對

失自信力的結晶品；第四，他以為全盤西化論係違反時代潮流的趨向；第五，他主張我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就現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盡量吸收現代的科學和科學所產生的文化，但絕不能全盤西化。我對於伍先生的見解和態度是不敢苟同的，我願意借此機會，再為伸說我們一貫的立場。雖然十多年來我們對於一般非難全盤西化論者的各種理論相疑問，都已有過詳細的解答（詳見「全盤西化言論集」及其「續集」「三集」）

×

「全盤」兩個字是不通嗎？我倒以為這在用語上并無不妥之處，就是「全盤西化」的涵義和主張也是很有意義的。從我們「西化」的歷程來看，如果我們承認「現代化」是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和東方最大的歷史的過程，則七十年前我們既可用「維新」「洋務」等用語和主張，以為指導當時的新時代新環境的文化理論，則今日更不可不用一更積極更徹底的用語和主張，以糾正今日仍有主張局部現代化或局部西化的錯誤。中國人對於「西化」的態度被內外新環境的要求每代確有每代的進步，今人如胡適之、陳獨秀先生等的「西化」態度，比較前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及張之洞、郭嵩焘等的「西化」態度，積極得多，澈底得多，而「西化」的事實，則今日的新中國，亦比過去進步得多，所以在現在的新中國，我們要造成「新文化」理論，以進一步來應付目前的新環境和新事實，我們非主張「全盤西化」便不能積極和不能澈底來進一步攝取西方文化以建設一個真正的現代化的中國。

所謂「全盤西化」的積極意義，就是在「西化」的進程中，注重將來文化的各種主要必不可少的要素，應有盡有的，完壁平勻的，形式內容兼備的，精神物質一體的，輸入，譬如輸入西洋的科學，也要輸入它的政治理想，倫理標準等，輸入民權也要輸入人權，輸入革命，也要輸入憲法，輸入男女的交際，也要輸入西洋的禮教和道德，輸入坐汽車住洋房的舒適，也要輸入造汽車建洋房的技術，就是說，我們不只要會「革命」，更要會「守法」，不只要會享受消費方面的西化活動，更要會創造生產方面的西化活動。所以我們認為在今日而主張「西化」非提出「全盤」即不能積極和不能澈底。

再從文化變動的原理來看，假使有兩個文化體系發生接觸，一個是較進步或較新的文化體系，一個是較落後或較舊的文化體系，所謂較進步的文化體系，說來，說來它的變遷至多，趣味至濃彈性至富，內容至豐，所以它所具有

的要素和價值，必為較落後的文化體系中所缺乏，這兩個文化體系接觸的結果，那較落後的文化體系必不能適應時境，勢將逐漸成為文化地層裏的一層，這種接觸也有它的過渡時期，在過渡時期裏，從其中一個文化體系，特別是從那較落後的文化體系方面看去，好像是有兩種文化平行並立，但是從文化變動的目的和趨向上看去，他們並非平行，並非並立，他們的關係是那較落後的文化體系逐漸成為陳跡，而那較進步的文化體系則逐漸伸張而成為送舊迎新的時代，這個時代也許延長很久，然它的趨勢只有一致，即從那較落後的文化體系看去，只有全盤接受那較進步的文化或新文化。假如我們是一個公平的批判者，我們不能否認今日的西洋文化是一個較進步的文化體系，中國或東方的文化是一個較落後的文化體系，所以在東西文化接觸的結果，西方文化已快快地變了世界文化，東方文化縱有保留價值也不過要變成西方世界文化的一小部分，從中國方面看來，這是「西化」的歷程，結果是趨于「全盤」「西化」「現代化」，或「世界化」。故我們近百年的「進化史」，簡直是一部「西化史」，即以前梁任公所謂「歐化的維新史」。因為在這種文化潮流之下，我們非這樣地趨于「全盤西化」，勢必不能使我們民族的生命延長和發展，這都是事實，明眼人自然明白，用不着多說了。「全盤西化」的理論既不見得有何不妥的地方，「全盤」這兩字又有什麼不通呢？

◎

×

「西洋文化」一個名詞有困難嗎？伍先生認為「西洋國家中，除了民主主義之外，還有獨裁主義，除了資本主義之外，還有蘇維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人類的生活樣法和文化是絕對不相同的，因此我們現在有幾種不同的「西洋文化」，而我們不能找出一種唯一的和代表的「西洋文化」，其實「西洋文化」這個名詞有什麼困難可言呢？若說在這名詞之下是滿有很多各異的成分與不少的衝突特性，使我們在「西化」的進程中無所適從，我以為這種看法是錯誤了。原來在一個文化體系中，它的各異成分與衝突特性之多，正表示其包藏較富，彈性較強，譬如就思想方面而言，過去中國思想派別之多，主張之紛歧，莫若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互相爭鳴，構成思想的黃金時代，這亦豈不是表示其包藏較富，彈性較強？在今日西洋的文化體系中，固有「民主主義之外還有獨裁主義，資本主義之外還有蘇維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等無數的各異成分和衝突特質，然而與其說這

是西洋文化的困難，不如說這是西洋文化克服困難之所存，又與其說這使我們無從西化，不如說這使我們易于西化。事實上在西洋文化體系中這些所謂各異成分和衝突特質，都已經或正在介紹到中國來，就只看我們的國民參政會，豈不是就已包括各黨各派，和容納各黨各派的思想和主張嗎？西洋文化體系中的各異成分，和衝突特質，我們尚且可以接受，何況它還有其共同的基礎？比方要滿足他們的政治欲望，他們都有共同的公心，愛國心，和制度化的政治，要滿足他們的經濟需要，他們都有共同的科學生產方法和分配方法，要滿足他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他們也都有共同的方式和工具。因為西洋文化有其共同基礎，所以它也是整個的，所以由專家以至常人，也叫「西洋文化」為一個「西洋文化」。「西洋文化」既是一個整體，既是一個對象，我們在全盤西洋的進程中，又有什麼困難可言呢？

X X X

中國的文化有其惰性，我們就不能「全盤西化」嗎？伍先生說「全盤西化論者完全忽略了社會制度和人類生活底惰性，以為一個國家可以完全拋開其原有的生活樣法和社會制度，而全盤接受另一種新的文化，所以是完全錯誤的」我們並不否認社會制度和人類生活方式底惰性，即文化惰性，然正因為中國文化惰性會成為我們澈底吸收新文化的障礙，所以我們非提出「全盤西化」不可。因為我們非這樣地說，這樣地主張，則在消極方面不能剷除中國文化的舊勢力或惰性，在積極方面則不能澈底擄取西洋文化的全部要素和價值，使中國的文化能和西洋各國的文化立于平等的地位，而繼續在這世上生存和發展。從我們「西化」的歷程和各方面來看，中國文化惰性，這亦即是中國的固有文化，是可以逐漸剷除的，而「全盤西化」即伍先生所謂「完全剷開其原有的生活樣法和社會制度，而全盤接受另一新的文化」是完全可能的。假如楊光先活到今日，他絕不會堅持「寡可使中國無好法律，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王秋生在今天，他亦不至再說「火輪船者，至拙之船也；洋砲者，至蠢之器也」等笑話了。就是抗戰之前，縱「提倡大刀隊殺敵者，現在也明瞭飛機大砲的重要性了。所謂文化惰性，是隨着「全盤西化」的進展而減輕，而「全盤西化」的進展，又是隨着文化的惰性的減輕而加速，這是研究過百年來中國西化史的人所容易了解的。

記得七年前在廣州文化論戰的時候，也有人以為中國有中國的國情——

即伍先生所指我們那套生活態度或文化的惰性——如歷史，宗教，風俗，習慣，等，使我們不能全盤西化，我在「為全盤西化答客難」一文裏曾經作過這樣解答，我說：

事實上基督教輸入了中國，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新教的輸入，也有了百餘年的歷史，不但是我們一般民衆有許多是信仰基督教，就是我們一般民衆有許多是信仰基督教就是我們的革命元勳與一般先烈也有不少是基督教徒。反對一夫多妻制的基督教，與儒佛道的宗教觀念不相容的基督教，打破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基礎的家庭制度的基督教，我們都能够吸收，試問現代的西洋文化，還有那一方面我們不能吸收呢？還有什麼「國情」可以作拒絕我們吸收西洋文化的力量？其次，關於中國的固有文化的本身，除了它的數千年的大家庭制度，還有數千年的帝制，千餘年的科學制度，這種思想制度和風俗習慣，在中國文化裏不可謂不根深蒂固，不可謂不居着重要的地位，然而我們都可以把它推翻，試問在中國文化裏還有什麼思想制度和風俗習慣我們不可以推翻呢？有了數年歷史的家庭制度，我們都可以把牠「西化」，把它變為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試問中國文化裏還有那一方我們不能同樣收到「西化」的效果？

不錯，在「西化」的進程中，我們文化的惰性似在把我們推向折衷調和的路上去，然而這種現象，只能當作東西文化接觸以後的一種過渡時期的畸形現象，這種現象的產生，在時間上也許很長，然其趨勢却是趨向于「全盤西化」的，這是稍具歷史眼光的人所容易明白，伍先生以為中國絕不能「全盤西化」，那豈不是「完全錯誤」？

X X X

全盤西化論是拜洋主義自卑主義嗎？是表示喪失民族自信力的結晶品嗎？關於這層，伍先生的態度是很不明顯，思想是很不清楚，見解得為淺薄的。他一方面指摘全盤西化論為拜洋為自卑等等，一方面却承認自鴉片戰爭後及時革新，結果國勢一天不如一天，民族自信力也一天比一天降低」。從這理論來觀察，我們的國勢和民族自信力的降低，伍先生豈不正是承認由於國家沒有革新或西化嗎？原來所謂民族自信力，并不是築在祖宗的光榮或固有的文化上頭的，而是要築在我們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努力上面的，伍先生

所認為具有「專家資格」的吳景超先生，豈不是早就解釋過嗎？他說：

自信心不應建築在某一時期的文化成績之上，凡是有歷史觀點的人，都承認的。假如在某一時期中因為自己的文化成績不如別人，便喪失了自信力，那麼在埃及的金字塔時代，希臘羅馬人的祖宗應當沒有自信力了。同樣的，在希臘羅馬的黃金時代，英德人的祖宗，假如把自己的文化來與他們對比一下，看見別人的偉大，回顧自己的鄙陋，豈不是要喪氣嗎？然而希臘人羅馬以及英人德人，并不因一時的落伍，便喪失了急起直追的勇氣，他們都有自信心的，所以都能够產生一個更偉大的時代。

（自信心的根據）載廿四年七月七日《大公報》

進一步說，全盤西化論不但不是表示喪失民族自信力，而正是真正民族自信力的表示，因為這個理論，這個主張，是確信我們民族的本領絕不低于西洋人為前提，因此認定西洋人所能創造的文化，我們也一樣能夠創造，西洋人有資格實行「民有」「民治」「民享」等原則，我們也一樣有資格實行「民族」「民權」「民生」等主義。西洋所以有今日那般燦爛的文明，實由於他們自信力的强大，故有種種新學說新制度產生，故能克服自然，戰勝環境，我這主張全盤西化，就是包括連我們的民族自信心也要「化」到「家」的，反過來說，假如我們根本就沒有自信心，我們根本就不配談「中國文化化的出路」，反之，認為中國文化絕對不能全盤西化——即不能追上一個較進步的文化體系與歐美的文化並駕齊驅——如伍先生所論，那麼，中國前途還有什麼希望呢？這豈不是正是表示喪失自信力嗎？這真不只是「拜洋」和「自卑」之尤者，而是奴隸的思想了。

X

X

X

全盤西化論違反時代潮流的趨向嗎？時代潮流的趨向是什麼呢？現代西

洋文化正在急劇地蔓延他洲，快要變為世界文化，東方的種種特色與世界潮流抵觸的自然快要成為歷史的陳迹，東方文化縱有保留價值，也不過要變為西方世界文化的一小部分，故在中國文化方面看去，這個歷史是「西化」，惟有「全盤西化」才是最適合這世界的時代潮流，而事實上，百年來國人對於「西化」的態度和中國「西化」的事實，却一代比一代進步，其目的是趨于「全盤西化」的路上。假如伍先生是忠于解釋和應付歷史事實的話，想不至否認我的話的，伍先生認為全盤西化論是「違反時代潮流的趨向」，是「

已成過去的思想」，那真是無稽之談，比方伍先生說到了二十六年，一般智識份子都捨棄了他所謂「拜洋主義和自卑主義」的全盤西化論，試問在二十六年前有那「一般智識份子」是主張全盤西化論，而到了二十六年後就把它捨棄了呢？還有點類乎說謊了。這使我們懷疑伍先生有沒有注意到國人對於西化的態度，至少我們認為伍先生在大罵全盤西化論和大談時代潮流之前，尚未盡過半點認識事實的責任。

X

X

X

中國文化的唯一生路是科學化嗎？伍先生的見解是矛盾的，他一面堅決否定全盤西化論，指摘全盤西化論為拜洋主義自卑主義，為表示喪失民族自信力的結晶品，一面却主張「中國一切學術文化工作都應該科學化」，所謂「中國一切學術文化工作」豈不就是全部「中國文化」？而所謂「科學化」豈不也是「西化」？豈非「自卑」？豈非「拜洋」？而況伍先生這個主張從中國文化方面看來還是「全盤西化」的。我在這裏不願隨便罵人是「拜洋」是「自卑」等等，我只願指出這「科學化」的提倡，是不够澈底的，又況事實上科學的提倡，已不止是二十年前胡適之陳獨秀等所曾致力，就是七八十年以前的曾國藩李鴻章，以至三百年前的徐光啓等，也已努力提倡過，而伍先生在三百年後的今日，却以為提倡科學化是一種新認識，那末，不但太沒有識見，而且恐怕還沒有讀過中國近代的歷史。何況伍先生所提倡的科學化，還不如廿多年前「新青年」的著作者所主張的澈底，陳仲甫先生說：

要擁護德（模克拉西）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因斯）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六卷一期）

〔本誌罪案的答辯書〕

這樣的態度，使提倡孔子化的梁漱溟先生也要贊道：

從前人雖然想採用西方化，而對於自己根本的文化沒有下澈底的攻擊。

陳先生和他們幾位的見解，實在見得很對，我們可以說是對的。

然而陳仲甫先生等的主張，還不是從整個文化着眼，故還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還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又何況伍先生，提倡科學化，還是三心兩意，說什麼「就現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盡量吸收現代的科學和科學所產生的文化」，我們若「就現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來「盡科學化或西化」，這是一條很含糊和很危險的路的，這就使在不西化或保持原有的文化基礎的

前提上，來盡量進行接受科學或西化，伍先生的思想是這樣的不健康和矛盾，無怪乎他說全盤西化是不可能，和承認「文化的情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為真理了；而且所謂「盡量科學化」或「盡量西化」等主張，是很有流弊的，它很容易被一般主張折衷或趨于復古者當作他們的護身符，例如伍先生所說要反對的東方文化論者，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也都可以同時吶喊「盡量科學化」或「盡量西化」；猶太太們坐汽車住洋樓吃西菜……也可以叫做「盡量科學化」，有些人以落後的生產能力，而却應有盡有地享受西化玩要方面的活動，也可以叫「盡量西化」了。伍先生以為他的主張是「我們唯一的生路」，是最適合這時代潮流，其實他的主張不但

## 談 談 獨 政 治

王贊愚

現世的獨裁國家，以蘇、義、德為代表，其興起的背景未必相同，其政制的運用亦互有差異；其實，它們根本上所相似的要點，就是重視「集團」的利益，而全置個人利益於不顧，雖然它們對「集團」的觀念也是不一致的。一階級之於共產的蘇聯，「民族」之於法西的義德，和法西斯主義的德國，同樣的是三者各所代表的「集團」之主體。證諸實際的情形，蘇聯在現行政制下，並未為無產階級謀最大之利益；國社主義的德，和法西斯主義的義德，所側重的亦祇是中產階級的利益。從這樣說過去，在這三國所謂「階級」、「民族」及「種族」，究竟是以「集團」替代個人，顯看似乎着重膚淺的利益，而抑偏狹的利益，實則其施政適與此相反，推翻傳統的自由主義，乃整個獨裁運動的動機，在理論上儘管作任何辯護，終不能使人改變如此看法。

至就攫取政權的方式來論，這三大獨裁國有何相似之點，亦是尙待考究的一個問題。當然，眼光比較敏銳的人，不專從方式中較異同，而且還要就背景或傾向上去觀察。蘇、義、德獨裁政治形成的過程，就是蘇、義、德代議制度崩潰的過程。舊治下的政府既失自信，對戰後的緊迫情勢應付乏力，又不堪國內外輿論之抨擊，明明知道國內有反抗力存在，而絲毫不加抑制，事猶豫寡斷；而他們的這類心理，便為少數反抗者所利用，因為在政府的放任容忍中，反抗者早已培養潛伏的實力，到了發難之日，政府的靈權失勢已成定局了。

獨裁者掌權的秘訣，即在遇機不輕失，鐵腕無憚忌，以政權為無上目的

不通，不但是落後，而且是危險。而只有「全盤西化論」，不折不扣的全盤西化，是中國文化的出路。這條出路，是遠在十三年前（民國十七年）盧觀偉，陳受頤及陳序經先生所會具體提出的。

今日中國是在抗戰中，這是整個的國力戰，國人莫不渴望我們國力的提高，然我們若要提高國力，誠如對於中國近代歷史認識很深的蔣廷黻先生所分析「我們不能不火速促進全體人民的全盤生活的現代化」。（見氏「國力的原素」一文）蔣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亦承認中國的問題根本是個文化問題，他並且指出這百年來中國歷史的教訓，是「中國要在近代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這豈不是我們所謂「全盤西化」嗎？

，待人自然殘酷已極。甚麼正義，法律，於獨裁者究有何用，政權在握一天，便恣睢跋扈一天。當然，我不說獨裁純是個人專政，尤其蘇、義、德三國的獨裁，絕非此類：世人所見的祇是史達林，黑素尼里，和希特拉；其實，這些獨裁者的背後，還有組織嚴密的政黨，和意志堅韌的黨徒。在今日的世界，凱撒式的個人獨裁，業已不適用了。凱撒在當時雖權大無比然較之現世獨裁者，似乎有遜色，因為他缺乏着黨，民眾和宣傳工具為其後盾，對於經濟，政治及社會組織的控制，始終還不及現今之嚴密。不過就個人的態度來講，今昔的「凱撒」根本是無大差別的。本來尊重人格，是實行法治的結果，凱撒主義既否認法治，必然在政治上祇管「馴人」，以人為政治工具，而人權是不足重視的。現世的獨裁者，雖說得振振有詞，自命為「集團」利益的保護者，但其忽視人格和摧殘自由的手段，和昔日的凱撒究有何別？蘇、義、德三國以崇拜暴力為特徵，但這並非說獨裁只有一類模型，並無程度之差異。由於議會制度的沒落，而使政治趨向於獨裁，縱然對和平方法不信任，但祇因那裏仍不全脫民主傳統的影響所以援用暴力似乎不如他國之漫無限制。蘇、義、德三國的政制，與其歸咎於民治試驗的失敗，不如推因於民治之未得充分試驗。而民治在這些國家未能生根發芽，戰後險惡的經濟環境實有以致之。經濟危機是政治糾紛的根源，因為民主政權在危機中，祇掩目聽任其滋長。假使這些垂亡中的民主政權，貿然暫時放棄法軌，出以高壓的手段，對付那般崛起的政敵，則它們政權的恢復，當不至演成必然之局。但它的支持者，大都是太講理智的人，素來過分重視法律，以致遇事猶豫寡斷；而他們的這類心理，便為少數反抗者所利用，因為在政府的放任容忍中，反抗者早已培養潛伏的實力，到了發難之日，政府的靈權失勢已成定局了。

蘇、義、德三國以崇拜暴力為特徵，但這並非說獨裁只有一類模型，並無程度之差異。由於議會制度的沒落，而使政治趨向於獨裁，縱然對和平方法不信任，但祇因那裏仍不全脫民主傳統的影響所以援用暴力似乎不如他國之漫無限制。蘇、義、德三國的政制，與其歸咎於民治試驗的失敗，不如推因於民治之未得充分試驗。而民治在這些國家未能生根發芽，戰後險惡的經濟環境實有以致之。經濟危機是政治糾紛的根源，因為民主政權在危機中，祇掩目聽任其滋長。假使這些垂亡中的民主政權，貿然暫時放棄法軌，出以高壓的手段，對付那般崛起的政敵，則它們政權的恢復，當不至演成必然之局。但它的支持者，大都是太講理智的人，素來過分重視法律，以致遇事猶豫寡斷；而他們的這類心理，便為少數反抗者所利用，因為在政府的放任容忍中，反抗者早已培養潛伏的實力，到了發難之日，政府的靈權失勢已成定局了。

說，民主政府如果有力應付經濟危機，保持繁榮於不墜，則我們不相信它是毫無抵抗獨裁狂潮的方法和力量。代議制度與資本主義結緣，諸多各國的實況，不無相當根據，雖然以制度本身論，我們否認二者是絕對不可分的，十九世紀是代議制度的黃金時代，因為當時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現在是代議制度受厄的時代，也因為現在就是資本主義受厄的時代。祇有經濟繁榮能保持下去，人民對國家的要求是有限的，而國家對人民的干涉也是有限的，如此，對政府懷怨，責謗以至反抗，自然不易發生，縱使偶然發生了，亦未必動現行政制的根基。

讓民主政府負統治經濟的全責，其成功的可能性未必較失敗為小。共和時代德國的努力，實不足作為佐證。德國當時處置經濟問題，弄到焦頭爛額，其失敗是由於「無力」抑「不力」，至今猶成一個疑問。當人民墜入失望的深淵之時，章理共和國除靜候觀望外在經濟上始終無所建樹，自身的最後崩潰，就是於此種下了主因。除德國不論，一段民主政府之無能，陷國內經濟於窘境，其癥結無非是各政黨不能團結一致，以組成強有力的政府。這種弱點是實行一黨制國家所沒有的。現今獨裁政治的引誘性，即在其表面上能避衆多難堪，但明眼人却未必要信它有如此廣大的作用。在現代代議制度之下，於多黨的必然影響，國內政治勢力的適當安排，是經濟機器運用成功，關鍵。話又說轉過來，國內政治勢力的適當安排，亦不得不繫乎健全的經濟環境之保持；祇有具備這個重要的條件，民治國家才獲到「一致基礎」，藉次以團結各黨及民衆。所謂「一致基礎」，在今日大致是經濟事實所造就，先後趨向獨裁，其走的路程幾乎是一樣的。因為社會上的「一致基礎」已被破壞了，議會不能達成及表達國家的真正意志，故各政黨首先對討論方式懷疑，而漸漸超出軌外以爭權；同時在經濟危機益迫中，堅急的處置更不能等待立法手續，終至於由行政機關以緊急法令行之；行政機關通常為執政黨所支配，而執政黨在上述場合之下，事實上便變成了主要的立法者。我們於此似可斷言向獨裁屈膝的國家，大都是隨着經濟危機的加深，自己不肯完全力在民治機構以內，企求一切可能的應付方法，結果釀成整個社會的不安，政治因而失掉均衡，無形中便開闢了獨裁的途徑。

獨裁政治在戰後的抬頭，其表示民治國家自動退讓的意義居多。我們為民治國家著想，要預防獨裁政治的侵擊，祇有一面增大政府應付經濟危機的權限，一面又酌量增加這種權限以相當限制。必須權限與責任均有合理的規

定，然後得使政治永遠保持其均衡。欲達到這項目的，民治國家的整個機構，均須予以澈底調整或重新改造，這當然是非借助於人類智慧不成功的。工作。我們切莫說認實行獨裁立可消弭經濟危機，反之，獨裁國家的經濟窘境往往更有甚於民治國家者。所以為解除經濟困境起見，民治國家祇宜就原有機構上求辦法，倘捨此而倣行獨裁，其危險則可以想見了。

我們祇分析着國內的政治勢力，還未必能充份了解獨裁政治的起因。尤其在上次大戰後的歐洲，獨裁政治的蔓延，大半是由國際各種因素所推動。任何獨裁國家，都帶着侵略的色彩，隨着領土的擴大和勢力的膨脹，傳播着極權主義於其他大小各國，到處都與傳統民治思潮挑戰。國際的思想衝突，本不自今日始，但這次歐洲大戰，乃這項衝突激烈化的表現。今番戰局不論如何演變，民治各國經過了一大刺激，對外既知聯合一致，共抗獨裁怒濤的侵襲，對內則當力謀自身改造，俾免獨裁傾向暗中作祟。從遠大處看來，目前或許是世界政治動向的一大轉捩。

## 本期撰者

何永佑先生是廬山雲南大學教授。李浩若及費鑑照二先生俱是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呂學海先生現在重慶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

##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華山南路一六五號

印 刷 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華山南路

總 經 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 售 全 國 各 書 局

價目 零售二角訂閱全年八元半年四元（香港以港洋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或折成美金五元）